

迎头赶上， 还是领跑全球

这本书的主旨，是分析美国教育改革的成因、现状、问题和解决方法。虽然书中也对中国的教育体系和教育模式进行了介绍和分析，但我的主要目的并非是对中国的教育进行评价和作出论断。这背后的原因，出于我在研究中国教育改革的过程中，观察到的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现象。那就是，在中国的教育尝试向个性化、多元化、注重创新和创造、降低标准化考试影响的方向转变的同时，美国的学者和政策制订者们则决定将美国的教育按照中国的模式打造，即通过标准化考试和统一教学大纲来确保和衡量教育质量。我认为，美国教育改革的这个方向对于美国学生和美国这个国家的长远发展而言，是弊大于利的。因此，在书中，我通过分析中国教育的历史和近年来教育改革经验，以及全球化和科技发展给所有国家的教育实践带来的挑战，向美国的教育工作者们阐释了美国教育所面临的真正挑战和应对的措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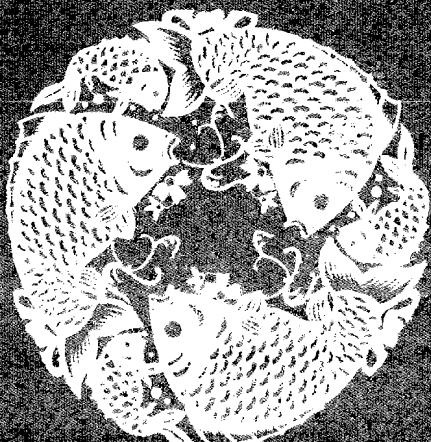


全球化时代的美国教育

赵勇◎著 解乃祎◎译 赵勇◎审订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迎头赶上,还是领跑全球:全球化时代的美国教育/
赵勇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8

ISBN 978 - 7 - 5617 - 8014 - 5

I. ①迎… II. ①赵… III. ①教育改革—研究—美国
IV. ①G57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55958 号

迎头赶上,还是领跑全球——全球化时代的美国教育

著 者 赵 勇
译 者 解乃伟
审 订 赵 勇
策划编辑 龚海燕
审读编辑 刘玉华
责任校对 邱红德
装帧设计 卢晓红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 - 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 - 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 - 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 - 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大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ecnup.taobao.com/>

印 刷 者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32 开
印 张 8.25
字 数 205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
印 数 1—5100
书 号 ISBN 978 - 7 - 5617 - 8014 - 5 / G · 4678
定 价 25.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 - 62865537 联系)



致谢

这本书能够完成,我想要感谢许多人,他们在不同的方面给予了我帮助和支持。圣玛丽学院(St. Mary's College)的凯斯·坎贝尔(Keith Campbell)教授应该是我在了解美国教育及文化的过程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个人。正是在他渊博的知识、有洞见的观察和富有激情的评判的影响下,我对美国公立教育有了意义深远的认识。为此,我要永远感谢凯斯。这本书最初的灵感,是来自于2004年亚太经合组织的教育改革会议。这次会议是由美国教育部、中国教育部和智利教育部共同发起的。我要感谢苏珊·斯克莱法尼(Susan Sclafani)博士、美国教育部长顾问罗德·佩奇(Rod Paige)先生、中国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先生、美国教育部的艾伦·金斯堡(Alan Ginsburg)博士和艾德里安娜·戴·坎特(Adriana de Kanter)女士,是他们给了我机会,让我负责会议中与研究相关的议题。我还要感谢香港新华教育基金会(Sunwah Education Foundation)和威廉与佛洛拉·休利特基金会(William and Flora Hewlett Foundation)对本次会议的支持。

在写作此书的过程中,我从与许多专家学者的对话中受益匪浅,他们包括斯坦福大学的丹尼斯·菲利普斯(Dennis Phillips)、亚洲协会的维维恩·斯图尔特(Vivien Stewart)、新华教育集团的吉尔伯特·蔡

(Gilbert Choy)、哈佛大学的费尔南多·赖默斯(Fernando Reimers)、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的百里安·考尔德韦尔(Briand Caldwell)、英国华威大学的阿尔玛·哈里斯(Alma Harris)和爱尔兰科克大学学院的保罗·康韦(Paul Conway)。同时,感谢锡拉丘兹大学的雷静(Jing Lei)博士阅读了本书的第一稿,并提供了非常宝贵反馈意见。

我在密歇根州立大学的同事们,给了我极大的支持和灵感。汤姆·伯德(Tom Bird)和肯·弗兰克(Ken Frank)是我的长期听众,同时也提出他们对本书写作的大胆设想。在此,我要感谢他们的智慧和鼓励。我还要感谢比尔·施密特(Bill Schmidt),我们进行了多次有关标准化、课程设置和中国教育的精彩对话。此外,杰瑞·布劳菲(Jere Brophy)、杰克·什维利(Jack Schwille)、狄克·普罗瓦特(Dick Prawat)和鲍勃·弗洛登(Bob Floden)都提供了他们的想法。我要感谢芭芭拉·马克(Barbara Markle)为我安排的许多机会,使我能够向立法委员和从幼儿园到高中的教育工作者们陈述我的想法,这也极大地帮助了我对书中的很多观点进行加工提炼。同时,也要感谢肯·德金(Ken Dirkin)不断地为我提供各种有用的资源并且启发了我的灵感。我还要感谢我的助理丽莎·佩恩(Lisa Payne)帮我有效地安排日程,使我得以有时间进行写作。

此外,我也要感谢赖春、倪如慧、王家文、邱蔚和解乃祎协助我进行参考文献的整理和书稿的校对。

我要感谢香港新华教育基金会和主席乔纳森·蔡(Jonathan Choi)博士,感谢他们的远见和资金支持,协助我们成立了中美优质教育研究中心。这个研究中心为我对中国和美国的教育进行深入研究提供了机会和平台。我还要感谢总部设在英国的 iNet 及其合作组织“特色学校学院信托基金会”(SSAT),是他们使我得以与全球各地的教育工作者进

行对话，并有机会关注全球化公民这一主题。

在此，我还要感谢我从管理与课程开发协会(ASCD)的工作人员那里得到的有力指导，特别是策划编辑珍妮·奥斯特塔格(Genny Ostertag)和项目经理达尔西·罗素(Darcie Russell)。

当然，没有我家人的支持，这本书是不可能完成的。他们不仅给予了我时间和鼓励，更是我的读者和灵感来源。我的夫人陈曦，是每一章完成后第一读者，她为我提供了恳切又充满鼓励的建议。我的儿子也晨(Yechen)和女儿阿西娜(Athena)也都不断地听我谈论这本书。他们为我提供了故事和参考，其中的一些也被收入书中。

照例，我在最后要做一个免责声明。虽然有许多人都在我写作此书的过程中提供了帮助，但我将对书中所有的错误负责。同时，我的观点不代表为我提供支持的团体和组织。



英文版序言

本书虽然是有关美国教育,但却是从对中国教育的分析开始的。我的初衷,本是要写关于中国教育面临的一些巨大挑战。这些挑战,具体地说,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美国教育家们不断高涨的,想要将中国作为优秀教育的范本去效仿的热情。他们认为,中国的教育系统已经或正在培养着能够对美国的未来造成相当威胁的、具有很强竞争力的学生。本来,我想要写的是,中国教改如何致力于课程设置和教材编写的地方化、如何使教学评估和考试更加多样化,以及如何鼓励教育的地方自治和创新,以培养具有创造力且全面发展的人才。我原想写的还有,在坚持不懈地想要弥补考试和标准化所带来的破坏的过程中,中国教改经历的种种失败。但是,就在我查阅教育改革政策、相关学术文章和有关中国教育的论坛和博客时,我意识到,中国想要得到的,恰恰是美国一直迫切想要丢掉的——一个能够尊重个性、支持不同的思考方式、包容与众不同的行为、鼓励创新的教育系统;同时,在这种教育系统中,学生们学什么以及老师们要怎么教,都不受行政干预;任何学校、老师和孩子,都不会以政府规定的那几门学科考试的成绩作为评判的结果,或以此进行排名。

我在中国长大,作为学生和老师,我亲身经历了中国的教育;作为教

育研究者,我更仔细研究过了中国教育的历史和近期的改革。因此,我能够理解中国教育改革背后的原因。中国正致力于由低端制造业为主的劳动密集型经济模式,向以创新为主的知识型经济模式转化。一个由创新驱动的社会一定是由创新型的社会成员组成的。而创新型的人才,绝不会是来自于那些强迫学生们背诵考试标准答案,或是看学生能否“反刍”那些以填鸭的方式教给他们的知识,来作为奖惩方式的学校。正因此,中国决心要把“应试教育”改变成为“素质教育”。为了实现这一转变,中国有意识地在全球范围内,寻找着可以效仿的模式,即一种有利于培养人才的教育体系。美国,这个有着最多诺贝尔奖获得者、最多原生专利、20世纪最多科学发现、并作为当今世界最强大经济体的国家,自然就成为了中国要学习的对象。

于此同时,美国却正努力地尝试着去做中国一直想抛弃的那些做法。联邦政府和越来越多的州都开始通过《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NCLB),州内标准化教学大纲和高中毕业考试等方式,对学生们学习的内容、进度、测评做出统一规定。最近,更有人提出要进一步加强政府对教育的控制,通过全国统一教学大纲和全国统一考试来加强标准化的程度,以及以考试成绩为标准对学生、老师和学校进行评估和奖励。

我觉得美国教育的这种做法着实令人困惑。中国——这个希望向创新型社会转变的发展中国家,一直在努力地试着效仿美国的教育模式,那么美国为什么想要放弃自己的做法呢?而且又是为什么,美国想要采取那些中国以及其他很多国家都极力想要放弃的做法呢?还有,最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美国,这个一直以保护个人权利和自由为最高宗旨的国家,现在竟然能够允许政府去限制他们的孩子要学什么、在什么时间学和怎么对他们进行评估呢?

真正促使我放弃最开始那个写作初衷的,是我在近几年观察到的一

些现象:《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以及对标准化及中央控制的不断高涨的热情,给这个国家带来的巨大伤害。坦白地讲,《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最初通过时,凭借我在以往美国教育的改革过程中得到的许多经验,我并没有觉得它会对美国的学校产生多大的影响。但很明显,我错了。

早在 5 年前,我的儿子就已经向我证明,我之前的想法是错的。某一天,在吃早饭时,他告诉我,他已经研究出一个方法,能使自己在密歇根州的写作考试中得到更好的分数。这个考试就是由密歇根州教育部设计的,以满足《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的要求的一种考试。我知道,儿子的写作一直都不错,但在去年的考试中,他没有得到很好的分数。虽然我对此并不是非常在意,但他好像一直都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而且一直在努力寻找提高的策略。但是,当我听到他说要如何取得高分的时候,我的心却往下一沉。基本上,他的策略就是,不再延续他一贯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风格,而是要按照老师教授和使用的评分标准去写作。在之后的考试中,他的成绩确实提高了。因为这件事和一些其他的原因,我们最终决定让他转学到一个不受《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影响的学校。于是,我的儿子从十年级的时候就不在公立学校继续就读了。

不仅如此,在过去几年中,我见过的不少老师和学校的领导,都在不断证明我曾经认为《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与之前那些教育改革措施并无差别的想法是错误的。从 2004 年开始,我就以“在全球化和科技发展程度不断加深的今天,学校如何做,才能成功地培养出具备全球竞争力和数字时代竞争力的多元化人才”这一主题,给各地的老师和教育领导者们做了至少 200 次报告。我的听众们包括地方的学校董事会成员、立法委员、社区领导、商业领导,还有老师、校长、学区总监和技术专家。报告的场合也多种多样,从学校开放日、职业培训,到国家及国际会议

等。邀请我去做报告的团体有教师工会、学校、州内或是国内的教育机构,以及大学等等。我认为,我所做的报告是受到大家欢迎的,因为我收到的邀请每年都在增加。但是,每一次在我结束演讲的时候,大家就会这样问:“我们完全同意你所说的,但是,我们的‘年度基本进度’(Adequately Yearly Progress)怎么办?”

接下来,一些更加系统化的证据让我认识到,我之前的观念是不正确的。已经有一些研究表明,《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已经导致相当部分的学校只教授考试要考的内容,并减少了那些不在考试范围内的学科的教学时间。这些研究还发现,为了使学生们在该法案规定的学科上达到规定的分数,很多老师都改变了他们的教学重点和教学方法。更有的一些州、学校和老师为了达到该法案的要求而作弊。

这些由《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导致的结果,正是我一直以来担心而又不愿看到的。根据我对像中国、新加坡和韩国这些国家的应试教育体系的了解,我预计,该法案会使那些规定学科的考试成绩上升,但非规定学科将因此受到冷遇,教育工作者们的士气和工作方式都会受到负面影响。此外,长此以往,公众就会认为考试成绩是评判学生、老师和学校好坏的唯一指标,最后,学校就会成为单一的考试准备机构。

《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的确造成了令人不安的破坏,但相比之下更让人害怕的其实是使这个法案生成的理念。因为,法律虽然可以修改,但这样的理念,却尤其有自己的生命力,一旦形成,不好更改,并且还会不断膨胀。虽然有很多人都在批评这个法案的一些具体内容,比如是不是所有的规定条款都有充足的资金支持,“年度基本进度”应该如何计算,或是这些规定是不是足够实际,以保证大家都能够实施等等;但是,却极少有人去挑战这个法案背后的逻辑。反之,关于国家统一标准、国际基准线和加强问责制的讲话,受到的关注和欢迎倒是在节节攀升。

《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背后的逻辑,是由有关美国教育的一系列观点构成的。首先,美国的教育处于危机之中。有两种“学业差距”能够证明这一点:一是国家间的差距;二是国内的差距。国家间的差距体现为美国学生在国际性测验中一贯不佳的表现。国内的差距则体现在城区少数裔学生和郊区学生间,在考试成绩和高中毕业率等其他一些学业衡量标准方面的差距。人们认为,这个危机是由于老师和学校的平庸和懒惰,不愿意或不能够用高标准要求他们的学生,也无法向学生们提供高质量的教学而造成的。化解这个危机的方法,就是要让这些教育工作者们负起责任来,让他们保证提交出可以接受评估的成果。当然,还要有一系列的奖惩方式来推动这样的问责制,包括:向公众公布学校表现,允许家长选择学校,指明表现欠佳的学校,并且将老师的工资与教学成绩挂钩等等。

接下来,将教学大纲和教学评估标准化并由政府统一控制,很明显就成了这个解决方法的一部分。只有要求一个州或全国的所有学校,都教授一样的内容,所有学生都参加同样的考试,我们才能知道学生们到底学了多少,才能区分出学校与老师的好坏。基于种种类似的原因,比如像所有学生都应该得到并能够去学习同样的高标准的课程之类的论点,标准化已经成为近几年美国教育改革中人们最热衷的概念之一。

《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背后的这种看似合理的逻辑,其实是漏洞百出的,其中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它导致了人才的同质化。在法案致力于保证所有孩子都能接受高质量教育的同时,它实际上是在暗示,高质量的教育,就是能够让学生们在有限的几门学科的考试中,取得高分。由此,学校在按规定教授标准化课程的时候,与其说是在提供“高质量”的教育,不如说是剥夺孩子们在其他领域发展才能的机会。同时,那些没有在有限的时间内,在规定的科目考试中得到满意成绩的学生,则遭

到了区别对待,他们因此被认为是能力欠缺的学生或是“差生”。理论上,学校是可以教授规定科目以外的内容的。但实际的情况是,学校必须保证他们在那些能决定学校名声和排名的科目——也就是那些标准化考试涉及的科目上表现良好。还有,理论上,我们也可以给所有的学科和教学活动设置标准,并要求学校教给孩子们这些全国统一或州内统一的课程。但事实上,就算是在中国,也只有那些高考涉及的科目才会得到真正的重视。在美国,这可以说是天方夜谭。克林顿政府曾经支持为9个学科设置全国统一标准,但其中的大部分都没有获得通过,因为人们在将何种内容纳入这9个学科中的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

采用国家统一标准的结果之一,就是学校所培养的学生,看起来会是千人一面,他们会具备同样的能力、技能和知识。这样的结果对于美国和美国人来说,都是灾难性的。因为,全球化进程和科技发展正不断改变着我们的世界,美国需要的是多种多样的创新型人才,来维系这个国家精于创新的传统。美国需要的,不是在世界很多个地方都能找到的廉价劳动力。纵然有很多不足,美国的教育系统一直以来,还基本都能满足创新型人才的培养需求,建立多元化的人才库。但是,这样的教育系统,正在《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和其他类似的改革措施的推动下,逐渐消失。

《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背后的逻辑,是将所有的责任都推给学校和老师。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它否定了导致教育中不公平现象的真正原因,那就是贫穷、经济差距,以及种族歧视引起的心理创伤。虽然学校确实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孩子们克服很多学习上的困难,但是学校的影响力毕竟是有限的。

由此可见,这个意在拯救美国的改革措施,实际上正在把这个国家推向危险。《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正在使美国教育陷入更深重的危

机,因为它很有可能导致对教育工作者们丧失信任,学生们的个人兴趣不再受到重视,地方的自主权和创新能力遭到破坏,人本身的价值也不能得到应有的尊重等等。

虽然《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和其所带来的破坏效应促使了这本书的诞生,但我写本书的目的并不局限于批评这个法案。本书的重点,是讨论美国教育面临的真正挑战,以及我们应如何去应对这些挑战。另外,书中还分析了近期的教育改革如何将我们的注意力从那些真正的危机上转移开,以及这些改革可能给美国教育现有的、能够应对未来挑战的那些特性带来的破坏。本书的开篇讨论了美国当前的教育改革内容,阐述了为什么这样的改革措施具有误导性。接着,我针对当前改革的产生和发展过程,进行了简要的历史性分析。这之后,我将本书最初设计的内容,减缩到第四章,即分析中国的教育模式,以及教育的中央集权、标准化及高风险考试所带来的危害。本书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要促使我们转变美国教育改革实践的航向,使我们不再关注于过去,而是放眼未来。因此,我用两章的篇幅讨论了在全球化和科技发展的影响下,未来的社会可能呈现的样子和发生的改变。这些改变要求我们重新思考,什么样的知识才是对未来的世界有价值的。我在之后的几章中,就着重分析了这些对未来有价值的知识、技能、态度和思维方式。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中,我为政策制定者、学校领导和教育工作者们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

虽然我并没有如最初设想的那样,完成一部有关于中国教育的书,但是我对自己的决定感到满意。撰写本书和收集、研究资料的过程让我受益匪浅。如今,我已经在美国居住 10 多年了。在美国的教育系统中,我做过学生、教授和两个孩子的家长。我也曾在多个学校做过研究,与政策制定者、教育家、家长和商业领袖们进行过沟通。因此,从很多方面

讲,我可以算是美国教育的“局内人”。然而,更使我感到幸运的是,近些年来,我有机会和来自十几个国家的教育工作者们一同合作。每年我都有大约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美国之外的地方工作,也因此,我还可以保持一个“局外人”的视野。这本书,恰为我将这两种体会和观点融为一体提供了机会。

美国的教育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我们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毁掉自己的优势,并力图在考试成绩上赶上别人;另一条是,要继续发展并强化自己的优势,以继续在创新和创造领域领跑全球。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帮助我们思考,促使我们改变美国教育的航向,并让一些读者相信,“领跑全球”是更好的选择。

赵 勇

2009年1月



中文版序言

2009年初,这本书(英文版)出版后,引起国内外许多同行的关注,后应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之约,由我的学生解乃祎译为中文。今天,中文版面世,我很高兴。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同仁们,是他们给我这个机会,向我的同胞们阐述自己对中美教育改革的一些思索和看法。

在本书的英文版序言中,我谈到了成书的动因、过程、目的和各篇章的主要内容,在此不再赘述。

这本书的主旨,是分析美国教育改革的成因、现状、问题和解决方法。虽然书中也对中国的教育体系和教育模式进行了介绍和分析,但我的主要目的并非是对中国的教育进行评价和作出论断。这是出于我在研究中国教育改革的过程中,观察到的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现象,那就是——在中国的教育尝试向个性化、多元化、注重创新和创造、降低标准化考试影响的方向转变的同时,美国的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们则决定将美国的教育按照中国的传统模式打造,即通过标准化考试和统一教学大纲来确保和衡量教育质量。我认为,美国教育改革的这个方向对于美国学生和美国这个国家的长远发展而言,是弊大于利的。因此,在书中,我通过分析中国教育的历史和近年来教育改革经验,以及全球化和科技发展给所有国家的教育实践带来的挑战,向美国的教育工作者们阐释了美国

教育所面临的真正挑战和应对的措施。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深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我们已经认识到,我们的下一代,将生活在一个崭新且时刻在变化着的世界中。他们需要的,绝不仅仅是在区区几门功课的考试中取得好成绩,而是要具备包括创造力、批判性思维能力、能在不同文化环境中生存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学习并使用新技术的能力,以及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等在内的知识和技能。因此,从这一点出发,我认为中国教育改革目前的方向是正确的。我也非常欣喜地看到,在中国有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政策制定者和媒体工作者,都已经认识到优质教育的真正定义,并在努力地通过各种途径推动着社会对于教育价值观的转变。例如,在最近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公开征求意见稿)中,就体现了这种精神。不久前我还看到,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四中校长刘长铭先生在新华网的访谈记录。他强调,培养创新型人才,要求我们放弃“科考情结”和“状元情结”,将培养的重点,放到人格、心理、能力等多方面的培养,将重点放到教育这个“缓慢而优雅”的过程当中,而不仅以最后能否进入名牌大学作为评判教育质量好坏的标准。对此,我颇有同感。

本书写作的最初对象,虽然是美国的教育工作者、政策制定者和家长们。但我希望,这本书可以从几个方面对中文读者有所启发。首先,本书讨论了全球化和科技发展给教育带来的新课题,包括如何定义高质量的教育、如何定义“人才”,全球化时代和数字时代下,何种知识、技能和能力是有价值和具有竞争力的,以及如何有效地对这些知识和能力进行评估等等,这些都是我们亟待思考的内容。

其次,通过本书,我也想为中文读者提供一个深入了解美国教育的窗口。在书中,我讨论了美国历史上一些具有重大影响的教育政策制定

的成因、当前美国教育改革的形成和发展，以及美国学校的一些实况。希望从这本书中，中文读者们能看到更真实的美国教育状况，看看美国教育是否真的如您之前所想的那样；同时，也通过这样的了解，思考两国在教育领域中各自的优势及问题都出自何处，借此互相借鉴，共同受益。

但愿这本书能给您带来些许收获和思考。

赵 勇

2010年3月于美国密歇根